

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文化外交”^{*}

——美国国务院中美文化关系项目初探

杨雨青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国务院开展文化外交,设立中美文化关系项目,通过多种路径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向中国民众展示美国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中国人了解美国。通过中美文化关系项目,美国在抗战时期加强了美国文化在中国的影响,也增进了中美两国在知识、学术、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合作。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是其对外文化战略的组成部分,服从于美国的整体战略和对外战略,目的在于通过各种文化交流,在中国塑造有利的“美国形象”,输入“美国理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方。

关键词 抗日战争 中美文化交流 文化外交 美国国务院 文化关系项目

和贸易、旅游、移民一样,文化交流是国与国之间正常互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国际关系一样古老,但开展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却是近代以来各国做出的新努力。美国学者查尔斯·弗兰克尔(Charles Frankel)把文化外交定义为:一个国家把海外文化政策视为其对外事务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并以国家政策为中心目标开展对外文化交流。^①中国学者彭新良博士则认为现代的文化外交:“是指主权国家以维护本国文化利益及实现国家对外文化战略目标为目的,在一定的对外文化政策指导下,借助包括文化手段在内的一切和平手段所开展的外交活动。”^②

抗战时期,美国政府曾对中国开展文化外交。当时,美国国务院出于加强美国在华影响、与中国密切合作、为本国利益和现实政策服务等目的,支持和鼓励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使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并未因战争而中断,反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美国国务院通过开展中美文化关系项目(Cultural Relations Program),向中国民众展示美国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中国人了解美国社会。这一时期,中美文化交流的途径多种多样,包括技术专家、留学、培训、学者互访、电影、广播、期刊、图书等。本文将美国国务院的中美文化关系项目为中心,讨论政府支持的文化交流计划以及文化外交的目的、实践与意义。

* 本研究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 985 工程第 3 期专项经费的资助。

① Charles Frankel, *The Neglected Aspect of Foreign Affairs: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Policy Abroad*, Washingto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66, p. 5.

② 张根海:《文化外交:向世界传播中国——评〈〈文化外交与中国的软实力〉〉》,《公共外交季刊》2011 年第 7 期, 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pdq/2011-09/07/content_23372222.htm

一 中美文化关系项目的缘起与启动

近代以来,美国开展对华文化活动,诸如传教士来华、建立教会教堂、传播基督教,兴办教会学校,开办医院和救济机构,创办报刊杂志,以及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等,都是中美文化交流的组成部分,也是美国对华传播文化、输出文化的直接渠道。但直到1938年,美国联邦政府还没有意识到,文化也可以是对外政策的一种工具,“不少美国官员不赞成以文化为外交手段”。^①

20世纪30年代,德国热衷于输出纳粹主义,积极通过文化对全世界施加影响。1936年,为在拉丁美洲反击纳粹德国的“文化进攻”,美国政府提议签署布宜诺斯艾利斯协议(Buenos Aires Convention),以促进美洲内部的文化关系,抵制纳粹的宣传。这项协议提供政府资助下的大学教授、研究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1938年,为鼓励和加强美国与其他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和知识分子间的合作,美国国务院又设立文化关系司(the Division for Cultural Relations)。^②同年5月23日,美国国务院资助召开了有关美洲内部文化合作的会议,以推进美洲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③美国从此开始在国际文化关系方面设立官方项目,向国外介绍美国的文化及生活方式,对一些国家实施文化交流计划,以促进美国文化的信息传播,扩大贸易、商务和政治影响,同时广纳精英为己所用。

珍珠港事变发生后,初生的文化关系项目很快被卷进战争。就在美国同日本宣战之后不久,美国国务院立即启动了一个对中国的文化关系项目。与对其他国家的文化关系项目一样,它包括教授、学生、团体领袖、技术专家的交流,电台广播、电影、书籍和翻译,文化研究机构,美国图书馆,美国资助的学校,技术培训和一些相关的项目,范围十分广泛^④,主要目的是为中国提供技术帮助,并促进中美之间更广泛的文化合作。

1942年1月29日,美国国务卿赫尔(Hull)在给驻中国大使高斯(Gauss)的电文中说,国务院决定向中国提供一种定义为文化支持的援助。其首要目的就在于紧急时刻能够激发中国人的士气。其次,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用美国科学技术、社会、教育、工业和其他方面的经验帮助中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城市居民生活环境,发展教育、社会和行政管理事业,以促进中国的抗战能力。为此,国务院从紧急资金中拨出15万美元启动这个项目,并且指示要完成以下几项任务,以实现上述计划目标:

项目1:技术和文化领域的领导者之间的交流,8万美元。该项目计划尽快输送美国学者及各个领域的专家到中国,让他们了解中国各方面的困难,与中国官员、学者讨论这些问题,并提出建议。专家组人员应包括医疗科学、公共健康、职业指导、农业、图书馆、物理学、化学、工程学、矿业、造纸工业等行业。

计划提出,如果中国提出要求,在公共管理、财政政策、社会治安、农村信贷等领域也应派出专家,人员不超过10人。如果运输设施有所改善,可以考虑邀请一些杰出的中国人来美国演讲,目的

① 杰西卡 C. E. 吉诺—赫克特(Jessica C. E. Gienow-Hecht):《一位欧洲人看美国文化的对外影响》,http://www.annian.net/show.aspx?id=18232&cid=9

② Wilma Fairbank, *America's Cul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 1942-1949*, Washington, D. C., State Department Publication 8839, 1976, p. 5.

③ Kevin V. Mulcahy, *Cultural Diplomacy and the Exchange Programs: 1938-1978*, Journal of Arts Management, Law & Society, Spring 99, Vol. 29, Issue 1.

④ J. Manuel Espinosa, *Inter-American Beginnings of U. S. Cultural Diplomacy*, Washington, D. C.: 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8854, 1976, p. 194.

是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习俗、制度和现状。

项目 2: 资助一定数量的中国学生到美国深造, 学习技术、行政和教育, 2 万美金。

项目 3: 发展一系列普通话和基本方言类的广播节目, 使中国人从更多方面熟悉美国的文化、制度以及抵御侵略的努力, 5000 美金。这些节目应起到教育的作用, 当然以后主要会发挥新闻的功能。利用这些节目的两个方式是: (1) 以直接短波广播的方式传导至重庆, 以中长波广播的方式传导至各省城镇。(2) 将这些广播的副本运到中国, 通过长波和中波在地方进行回放。

项目 4: 电影, 1.5 万美元。向中国运送两卡车投影设备, 以便在中国的省城和农村地区放映一系列电影: (1) 使中国各阶层了解美国人的生活、制度及战争努力; (2) 放映政府关于现代农业方法、动物养殖、公共卫生、儿童福利、产妇健康、水土控制、森林保护等影片。

项目 5: 为内迁大学捐赠急需的教科书、显微镜和其他科学设备, 2 万美元。^①

美国国务院花了相当多的时间, 仔细考虑了这个计划的各个分项目, 并请驻华大使高斯坦率提出意见。赫尔还指示高斯, 可与中国政府官员讨论这一项目并且声明, 美国政府认为文化关系在本质上是一个双向过程, 因此也欢迎中国政府在美国进行相应的文化活动。

二 中美文化关系项目的开展和路径

按照上述国务院文化关系项目的计划, 美国通过多种路径, 开展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与文化合作。但由于战争急需, 当时美中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侧重于增强中国的抗战能力和支持抗战经济。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此时的教育和文化计划被包含在中美政治和经济关系之中。

(一) 派遣技术专家

这是 1942—1945 年对华文化关系计划中, 耗费最多时间、精力和资金的项目。^② 美国政府对此用心颇多, 他们希望在援华专家向中国提供技术指导的同时, 传播美国的思想文化, 灌输美国意识观念。^③

1942 年 2 月, 美国国务院授权高斯与国民政府沟通, 向中国各部部长和其他官员详细解释国务院的文化关系项目, 请中国提出在哪些领域需要技术专家。3 月 17 日, 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对此作了仔细研究, 由外交部向高斯提出名单, 希望美国向农林部、卫生部、教育部、经济部和交通部派遣专家和工程师。^④

3 月 27 日, 高斯将这份名单汇报给国务院。4 月 2 日, 代理国务卿韦尔斯 (Welles) 回电表示, 准备尽快挑选并派遣国民政府所需要的 10 名专家前往中国。

大约有 175 名候选人按要求提交了他们的职业简历, 将近 100 人进行了面试, 最先选出的是玉米和土豆育种专家, 其他方面也确定了 1 或 2 个候选人。1942 年预算中预留给这些专家的费用为 10 万美元, 他们于 1942 年夏被派往中国。^⑤

此后, 中国政府又提出了第二份名单, 希望美国再派 15 名专家到财政部、经济部、农林部、卫生

①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Jan. 29, 194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after cited as FRUS), 1942, China,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6, pp. 697—700.

② Wilma Fairbank, *America's Cul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 1942—1949, p. 57.

③ 张注洪著:《中美文化关系的历史轨迹》,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180 页。

④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r. 27, 1942, FRUS, 1942, China, p. 707.

⑤ *Memorandum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10, 1942, FRUS, 1942, China, p. 715.

部、交通部、教育部、水力事务委员会和新闻局服务。^①

1942—1945年间,美国国务院共选派农业、通讯、工程、水利、工业、新闻和卫生等领域的28名专家赴华,1942年6名,1943年16名,1944年4名,1945年2名。^②

这些专家刚到中国时,出现过一些问题,美国国务院都及时地进行了处理。

一是关于部分专家对中国有过轻蔑评论的处理。

当时,在美国的中国教授反映:有两名在昆明的美国文化关系专家对中国发表过非常负面的评论。中国教授难以理解,为改进两国关系而派去中国的文化人员,会发表这种容易引起两国关系恶化的言论。美国国务院得知后,一方面由文化关系部官员做出解释,说明喜欢批评是美国人的特点,美国人认为批评是件好事,如果有更多的批评,将对中国更好。实际上,中国人也有批评美国的自由。^③另一方面,国务院立即指示美国驻华大使馆,让他们在适当机会提醒专家注意,他们的不当言论会使中国重要人物和公众对国务院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国务院希望能从他们的评论中获益,这种令人不快的批评性评价,只应报告给大使馆或国务院官员,国务院会将这些评论恰当而且秘密地分发给相应的感兴趣的机构。国务院希望文化关系专家在写文章或会见中国人时,对中国事务保持克制。^④

二是关于某些专家与美国大使馆之间产生摩擦的处理。

1943年11月11日,保罗·伊顿(Paul B. Eaton)教授写信抱怨大使馆人员不关心他的福利,而大使馆却在11月30日的第1867号公文中提出:“部分专家对自己工作的各方面及确切地位,缺乏综合的、明确的了解。”国务院认为,促进与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文化联系,正在成为政府认可的职能。为促进这种联系,政府有必要依靠美国公民的帮助,依靠技术、教育和研究机构。派往中国的专家,是促进对华文化联系的要素之一。国务院希望大使馆官员依靠他们的宽容、智慧和努力,表现得耐心和得体,改善专家们国外生活的困难,处理好与美国专家的关系,使专家能在中国开展好工作,以利于国务院文化关系计划的施行。^⑤

通过协调,美国技术专家的工作开展得较为顺利,最后得到中美双方的肯定。例如,设计工程师约翰·萨维奇(John L. Savage)在中国期间,参观了5个主要的水力发电站,帮助中国进行设计,其中最主要的贡献是参与了长江三峡工程的设计规划。美国对修建三峡工程很感兴趣,认为它不仅有助于中国的工业化,而且可以解决长江的洪水控制和灌溉问题,将极大地改善附近人民的生活条件。萨维奇不仅协助中国制订详细的规划,并且协助中国经济部与美国垦荒局研究如何完成这一工程。中国当时的经济部长翁文灏评价说:“他的服务对我们水利工程的发展是无价的,他不间断的工作和良好的精神面貌,对有幸接触过他的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动力。”^⑥又如,佛洛伊德·泰勒(Floyd Taylor),主要从事新闻报道的编辑工作。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认为,泰勒是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项目委派的人员中表现最好的之一,“他较善于与中国人交往,得到了中国同事以及外国通讯记者的信任与好评,他与大使馆也保持了良好的合作。他对中国新闻出版业状况的报

①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ne 29, 1942, *FRUS*, 1942, China, pp. 713—714.

② Wilma Fairbank, *America's Cul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 1942—1949*, p. 214—216. *Memorandum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Oct. 28, 1943, *FRUS*, 1943, China, pp. 754—756.

③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Mr. Paul W. Meyer of the Division of Cultural Relations*, Dec. 20, 1943, *FRUS*, 1943, China, p. 763.

④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Jan. 5, 1944, *FRUS*, 1944, China, p. 1111.

⑤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Feb. 21, 1944, *FRUS*, 1944, China, pp. 1117—1119.

⑥ *The Chinese Minister of Economic Affairs (W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ec. 15, 1944, *FRUS*, 1944, China, pp. 1154—1155.

导,证明他是一个有经验的新闻人”。^①

(二)资助中美文化协会

当时,重庆设有中美文化关系协会(Chinese American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ations),该协会成立于1939年2月22日,主席是孔祥熙。^②到1942年时,它已在重庆拥有3间办公室(借自新生活运动总部),开设有一个小型图书馆,并放映美国传送的电影。

鉴于中美文化协会宣称的目标与文化关系项目相似,美国国务院计划资助其一笔资金,以便让它购买家具,在中国重要城市设立分支机构,订阅一些美国期刊以及若干有关美国历史、思想和人物传记的英文书籍。国务院希望通过财政援助,使它成为更加活跃的机构,以促进中美友好。^③为此,国务院特别致电给高斯,征求意见。高斯于4月14日回电指出,在过去的几年里,中美文化协会在财政部长孔祥熙的主持和控制下,其活动基本局限于一些周年纪念或特殊场合,以显示孔个人的好客。当然,高斯也承认,该协会近来正致力于重新组织,起草新的章程,制定计划以扩展协会的活动,如提供阅览室和图书馆,赞助演讲,为在美国的华人争取奖学金,等等。如果计划成功执行,高斯相信这个组织或许能作为国务院对华文化关系项目的对象。^④

在研究了高斯的报告以后,国务院得出结论,中美文化关系协会已经稳固建立,并且正在从事促进中美之间文化关系的活动。1942年7月23日,罗斯福总统拨款资助中国的文化机构,国务院决定在1942年财政年度里,捐助中美文化协会1.8万美元以支持它的活动。如:在其他城市建立分支,购买包括电影投影机在内的设备,聘请有能力的秘书,收集中国留美归国学生的传记资料,等等。国务院还考虑给协会提供在中国无法获得的设备,如动画投影机、教育影片、图书、杂志、缩微胶卷、放映机、宣传画和录音唱片等。^⑤

(三)资助在美中国留学生

战争爆发后,许多中国学生或因无法归国而滞留美国,或因资助中断而导致学费、生活费困难,如何帮助这些学生就成为当务之急。国务院任命一个由两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推荐那些值得资助的中国学生。这笔资金总数为2万美元,分给91名学生,每月75美元,支付期为1942年4月至6月共三个月。

当时,中国学生的需求持续增大。罗斯福总统收到许多杰出人物的来信,敦促政府为美国大学里的中国学生提供更多帮助。征得助理国务卿肖(Shaw)的同意,国务院在文化关系项目下又额外分配了1.5万美元用于资助这些学生,这使另外66名学生也得到每月75美元的补助。这样,国务院在1942年财政年一共帮助了157名学生。^⑥

美国政府资助中国留学生,有其长远打算,美国看重这些学生未来的发展潜力,认为其中可能会出现中国未来的领导者,将对以后的中美关系与中美文化交流产生一定影响。到1944年为止,美国国务院共补助了大约400名中国留学生,使他们得以在美国完成学业。

(四)派遣留美学生的合作与争执

1. 留美学生的派遣

战争期间,中国大学水平退化,毕业生水平降低,导致中国缺乏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为培养

①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r. 25, 1944, *FRUS*, 1944, China, p. 1128.

② 四川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网站, <http://www.scfao.gov.cn/wsz/010201.htm>.

③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Apr. 9, 1942, *FRUS*, 1942, China, pp. 708—709.

④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pr. 14, 1942, *FRUS*, 1942, China, pp. 709—710.

⑤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Nov. 4, 1942, *FRUS*, 1942, China, pp. 726—727.

⑥ *Memorandum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10, 1942, *FRUS*, 1942, China, pp. 715—716.

抗战建国以及战后重建工作人才,国民政府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改变限制留学办法,放宽留学政策。

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向行政院提交了一份计划,打算在以后的5年中,每年送1000名中国学生出国学习,其中700名到美国,300名到英国。^①美国教育界对此兴趣极大,国务院也相当关注,力图使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不单纯学习技术,而是能够欣赏美国生活方式。^②

10月7日,高斯向国务院报告,中国将派出1200名学生出国学习技术或管理,800人到美国,400人到英国。教育部、交通部和经济部分别选派700、300和200名学生,其中10%由相关部门指派,其余通过考试选拔。^③但实际派出的学生只有计划的一半。

接收这些学生,给美国带来过相当大的困难。首先是交通,在当时紧迫的交通条件下,如何安排这么多学生到达美国,就是个大问题。其次,安排几百人来美国就读,也使那些美国著名大学为难,因为很多名校已有大量的外国学生,尤其是中国学生(大多数中国学生会选择名校)。这迫使国务院牵头,解决诸如中国学生聚集在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和旧金山湾区等高校的问题,好让他们分散到美国其他地区的其他大学。^④

美国国务院以及一些教育和商业机构,都希望有机会帮助中国抗战及战后重建,因此非常关心并愿意资助中国政府的培训计划。美国政府授权大使馆向中国政府表明态度,欢迎中国学生到美国培训,愿意提供必需的、可能的、合适的帮助。^⑤在这种有利条件下,中国政府从多种管道加强了赴美学生的派遣。

除上述公派学生外,1943年12月,中国教育部组织了第一次自费出国学生的测试,录取了326人,他们于1944年赴美国留学。教育部还计划1944年再举行考试选拔学生,并计划于1945年春派去美国,他们的所有费用将由美国机构支付。1944年,教育部计划选送50人到美国考察和研究教育、科学、技术、医药和农业,这些人由中国政府资助。此外,美国的一些教育机构,提供41项助理研究奖学金给中国技术院校,芝加哥国际收割机公司也授予20名中国学生奖学金。^⑥

2. “思想控制”问题

中国政府在计划派遣留美学生时,准备在美设立监督机构,派出专职人员,以管理和监督中国留学生。这在美国看来,却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控制”(thought control),违反了美国思想自由的传统,因此坚决反对。

美国驻华大使馆认为,在这样一种严格的选拔和控制系统之下,持自由主义政治信仰的学生,或者那些对国民党持怀疑或批评态度的人,是很难获得教育部批准到国外留学的。监督管理中国在美学生的规定,以及“如有违背三民主义之言论及越轨行为,经查明属实,即取消留学资格”^⑦的做法,表明国民党准备控制中国教育。^⑧

① *The Charge in China (Atche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ly 22, 1943, *FRUS*, 1943, China, pp. 744—746.

② *The Charge in China (Atche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ly 22, 1943, *FRUS*, 1943, China, pp. 744—746.

③ 《32年度派遣国外学习人员计划遵办情形》记载的派遣名额为:教育部685名,交通部285名,经济部190名,军政部30名,中央研究院10名。国民党中央设计局档案,转引自王奇生著:《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

④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Sept. 6, 1944, *FRUS*, 1944, China, pp. 1150—1151.

⑤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Sept. 27, 1943, *FRUS*, 1943, China, p. 748.

⑥ *The Chines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Soong) to the American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Nov. 3, 1944, *FRUS*, 1944, China, p. 1153.

⑦ 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转引自王奇生著:《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第247页。

⑧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 16, 1943, *FRUS*, 1943, China, p. 757.

1944年3月14日,美国国务院授权驻华大使提醒中国外交部长注意,国务院不赞成中国政府对中国留美学生进行政治监视。美国很多大学和报纸也表示希望中国政府取消对留学生的控制。^①4月8日,赫尔甚至指示高斯,应推迟签发去美国监管学生的中国官员的签证。^②4月12日,高斯就此事与宋子文进行了谈话。

美国对“思想控制”问题的批评,使一些中国政府官员不满,蒋介石甚至对这种批评感到愤怒。^③4月26日,行政院宣布,所有留学生一律暂缓派遣。5月3日,宋子文告诉高斯,蒋介石已经下令停止所有学生和技术人员去美国。^④

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和对立,几乎使留美计划流产,好在中国政府很快转变。5月17日,国民政府发言人声明,推迟任命留学生主管,并将修改留学规定。中国还声明,政府只是指导学生思想,从未想影响学术自由。中国留学生所在国家的教育系统和传统精神都将得到尊重,中国愿促进和友好国家之间传统的学术和文化合作。^⑤9月20日,国民党中央社报道,教育部确认,中国学生出国学习的禁令已经取消。^⑥

(五)中美教授(知识分子代表)互访

1942年10月13日,代理国务卿韦尔斯通知驻华大使高斯说,国务院期望6所中国大学各选一名代表,到美国居住一年,通过在各自领域的深造受益,并且通过接触教育领域的发展,使他们所属的学校受益。同时,他们可以通过讲座、演讲或会见,引起美国社会对中国教育的注意。在与宋子文谈话时,美国国务院阐明,邀请中国知识分子领袖到美国来,不仅可以给他们留下友好印象,而且可以作为中美文化交流互惠的象征。^⑦

国务院计划邀请中央大学(重庆)、西南联合大学(昆明)、云南大学(昆明)、中山大学(广东)、四川大学(峨眉)和武汉大学各选派一名代表。^⑧从离开中国到返回,每人将得到每餐10美元的补贴,以及在美国购买必要设备的补助500美元,在海外以及美国的交通费用由美国支付,但美国政府不承担旅途风险责任。

10月21日,高斯回电表示,受邀请的大学名单中遗漏了浙江大学,因为按照学术地位排列,浙江大学与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和武汉大学同样具有高水平,而中山、云南和四川大学的教师和课程水平较低。高斯建议,国务院应重新考虑受邀大学名单,同时可以考虑以中央研究院和南开经济研究所代替某两所大学。

10月27日,国务卿赫尔致电高斯,表示可以浙江大学取代中山大学,但希望保留云南大学和四川大学,以鼓励中国西部的发展。中央研究院和南开经济研究所已有研究人员在美国,国务院也将考虑负担其学习费用。^⑨

1943年3月27日,中国外交部挑选的吴景超、吴贻芳、晏阳初等6名知识分子出发前往华盛顿,据说这些人是从宋子文准备的60人名单中选出的,而名单是宋与华盛顿的美国知识分子接洽

① 《行政院决定停止派遣留学生出国,美学术团体反对控制留学生思想》,《解放日报》1944年5月4日; *Memorandum by the Special Assistant of the Division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Art (Peck)*, Apr. 6, 1944, *FRUS*, 1944, China, pp. 1132-1133.

②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Apr. 8, 1944, *FRUS*, 1944, China, p. 1135.

③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pr. 25, 1944, *FRUS*, 1944, China, p. 1139.

④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4, 1944, *FRUS*, 1944, China, p. 1139.

⑤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18, 1944, *FRUS*, 1944, China, p. 1143.

⑥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 24, 1944, *FRUS*, 1944, China, p. 1152.

⑦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harge in China (Atcheson)*, May 13, 1943, *FRUS*, 1943, China, pp. 736-737.

⑧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Oct. 13, 1942, *FRUS*, 1942, China, pp. 724-725.

⑨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Oct. 27, 1942, *FRUS*, China, pp. 725-726.

后拟出的。

费正清评论道,选这些人赴美原因,在于他们是中国入中最接近美国理念和性格的;这些人没有“CC”系的关系,在政治上也不重要;除了吴景超以外,没有人精通政策事务;而且他们都是亲美的。^①

1944年应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者,有汪敬熙等6人,1945年有梅贻宝等5人。^② 据统计,自1943—1947年,共有26名中国教育家和艺术家作为美国国务院的客人访美^③,他们在促进中美知识界和艺术界的接触以及中美文化交流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美国国务院邀请并资助中国知识分子代表到美国,也有利于促进他们和美国各行业领袖之间的接触,以便中国政府获得直接而可靠的信息,了解美国在与中国利益有关的问题上的意见。^④

邀请中国教授访问美国的同时,美国国务院也筹集资金用于美国教授到中国访问1年。锡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的克雷西教授(葛德石,George Cressey),是第一个由政府出资派往中国的美国教授。作为战时与中国文化关系项目的一部分,国务院希望他能担当对外文化关系局的代表,向国务院推荐改进和发展这个项目的办法,以使这个项目在教育群体中更有成效。^⑤

由于中国国内及国际政治问题非常尖锐,国务院在克雷西教授出发前即规定了任务,并于1943年11月17日以备忘录形式送达美国驻华大使馆:

1. 他的主要任务是应邀访问中国大学,演讲和出席会议。演讲将包括美国整体学术发展和他自己的专业——地质学和地理学。在他的演讲和谈话中,应强调学术自由的价值、知识系统的完整性、知识的广泛传播和应用。

2. 他将从美国科学研究院带一封信给中央研究院,应与中研院建立密切关系。

3. 他在中国的关系总体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与教育部及中国政府其他政治机构的关系;第二类是与教育及文化机构的关系。这些关系应服务于加强中国民主倾向的目的,希望最终结果能说服政府机构和人员以民主方式思考,促进大学和教授拥有和美国一样的教育观、国际观。

4. 既然文化关系项目是对整个中国服务的,那些较小的、偏远的、与外国少有接触的学校,应该和重点院校一样得到帮助。旅行计划要等他到重庆之后准备,但范围是远到东部的福建,或西北部的新疆。

5. 作为他工作的副产品,应准备一个对所有中国大学的评估,包括教员、设备、学生及需求等。

总之,国务院希望克雷西不仅从事与他专业有关的工作,而且也时刻记住文化关系项目的使命,希望他能对现在及将来与中国的文化关系项目提出建议,包括对缩微胶卷、交换学生和教员、大学需求等问题的意见。^⑥

此后,国务院又准备安排其他美国教授访问中国6所大学,教授们的薪水由国务院提供,食宿则由接待学校提供。^⑦ 1944年8月16日,美国国务院计划重点派人文学科的教授访问中国大学。为此,国务院将原计划派出的技术专家减少至6人,基金减至9万美元;人文教授增加到6人,基金

① *The Charge in China (Vincen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r. 21, 1943, *FRUS*, 1943, China, pp. 734—735.

② 《中国国民党六大会行政院教育工作报告》(民国34年5月),杜元载主编:《革命文献》第58辑“抗战时期教育”,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2年版,第413页。

③ 倪亭:《往事值得回首》,《21世纪》2001年第11期,第10页。

④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harge in China (Atcheson)*, May 13, 1943, *FRUS*, 1943, China, pp. 736—737.

⑤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harge in China (Atcheson)*, June 25, 1943, *FRUS*, 1943, China, p. 742.

⑥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June 25, 1943, *FRVS*, 1943, China, p. 751.

⑦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Sept. 15, 1944, *FRUS*, 1944, China, pp. 1151—1152.

增加到 73800 美元。国务院认为在以下领域派出人员最合适：美国历史、西方政治哲学、经济学、现代西方文学、社会学、创造艺术。^① 大使馆建议这些教授依次访问成都、昆明和重庆三个中心，每处停留一个季度。第四季度可由教授选择，分别去一些偏远的地方，以促进那里的学术发展。^②

(六) 期刊、图书、缩微胶卷等

文化关系项目拨出的另一项资金，主要用于向中国提供缩微胶卷，因为在两盎司的胶卷上就能复制一本 300 页的书。这样中国人就可以用多种方式获取阅读数据了：直接从胶卷阅读，从胶卷再印刷出书籍，或将胶卷中的内容翻译成中文再印刷。

为此，国务院订购了一批轻型缩微胶卷阅读机。一位文化关系官员与美国国家档案馆合作，设计出一种两磅重的缩微胶卷阅读器，可以空运到中国。1942 年 6 月，国务院向国家档案馆订购 100 台这样的机器，每台大约 25 美元，总计 2500 美元。

与首批阅读器同时提供给中国的，还有两卷 100 英尺长的缩微胶片，这些胶卷包括 1600 页有关战后计划的数据，以及 1900 页最新的科学和学术期刊，每个胶卷的印刷品连同若干阅读器捐赠给中国西部的的主要大学。后来，每月运往中国的缩微胶卷达 10 万页，每套胶卷包括 5 份拷贝及一份底片。^③

此外，一些杂志也以纸张的形式运送到中国，1942 年 4 月，美国驻华大使指令订阅 9 种美国期刊，通过外交邮件运到中国首都重庆的阅览室。^④ 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还同纽约的出版机构合作，向中国提供新版教科书，至 1944 年 6 月，已有 20 种运抵中国；1945 年，又有 100 本赠给武汉大学。这些工作，使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获得了美国的教学和科研资料。^⑤

(七) 广播和电影

中美文化关系项目用于无线电广播的经费是 5000 美元，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与战争信息部合作，用这笔资金制作文化方面的广播。^⑥ 节目制作好后，和新闻广播一样，从美国发送到中国，再由中国当地电台翻译，对中国进行广播。

与广播并重的项目是电影。在项目开始进行前，国务院做了大量研究，并于 1942 年 6 月完成了一份 60 页的报告，包含以下信息：能供给中国的放映机、必备的操作人员、过去 10 年在中国使用美国教育影片的经验等。

在 5、6 月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将 8 盘有关教育的 16mm 有声影片空运到重庆，以制成一个 2 小时的节目。此外，中国还获得 21 盘其他影片。

第一部为文化关系项目制作的、配有中文字幕的政府宣传片亦于同年 6 月完成。一位在纽约的中国艺术家兼作家配备了这些字幕，并为另外 3 盘美国影片进行中文配音。

一部为中美文化关系项目特制的影片在 6 月开始生产。美国陆军部出资让几个摄制组拍摄亚利桑那州和佛罗里达州的中国飞行学员，文化关系官员则指导写出剧本，电影于 8 月份在好莱坞剪辑。^⑦

1943 年，对外文化关系司又完成了大约 30 盘电影的中文配音，并为中国制作了大约 7 盘新影

①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Aug. 16, 1944, *FRUS*, 1944, China, p. 1147.

②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 1, 1944, *FRUS*, 1944, China, pp. 1148—1149.

③ 《四川教育通讯》，1945 年 5 月 8 日第 1 期，第 5 页。

④ *Memorandum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10, 1942, *FRUS*, 1942, China, p. 716.

⑤ Wilma Fairbank, *America's Cul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 1942—1949, pp. 50—53.

⑥ *Memorandum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10, 1942, *FRUS*, 1942, China, p. 717.

⑦ *Memorandum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10, 1942, *FRUS*, 1942, China, pp. 716—717.

片,这项工作投资2万美元。1944财政年度内,文化关系司计划为中国生产另外70盘电影。这些胶片都是16mm的,不能在商业影院放映,只能用于学校、俱乐部和政府办公室。

此前,在一些南美国家的首都,放映这样的美国电影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据派到那里的文化关系官员统计,每月有25万人观看美国非戏剧电影。在拉丁美洲,每个国家只有2至3台放映机,而在中国至少有12台,因此美国驻华大使馆相信,放映美国电影这种方式可以产生非常有益的影响。^①

三 中美文化关系项目与其他援华项目的联系与区别

美国国务院中美文化关系项目下所包含的一些计划,与美国其他部门的同类项目有相似性。国务院通过正式信件和官方电话,与有关部门建立联系,并通过频繁的磋商进行合作。但是,二者之间也有区别。

(一)与经济作战部(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的关系

国务院与经济作战部都派专家到中国,但两个部门所派专家的作用不同。国务院在1942年文化关系预算中提供10名美国专家为中国政府服务,由中国政府列举所需专家类型,这些美国人承担中国政府指定的工作,而不是美国政府。相反,经济作战部派出的专家却是为美国政府工作,为美国收集经济信息,加速从中国往美国运送战略物资。

尽管如此,两个部门在执行功能上并无冲突,为某一部门需要而派往中国的人,可以留在那里为其他部门执行任务,这样就为美国节省了旅行费用。1942年2月26日,国务院通知包括经济作战部在内的大多数行政部门,任何往国外派人的计划首先应提交至由韦尔斯、艾奇逊(Acheson)和肖组成的委员会审核。国务院在对外服务管理局建立所有政府外派代表的档案,以避免各部门派往国外人员重复的现象。

在选择派遣到中国的专家时,国务院文化关系官员与经济作战部密切合作。1942年3月27日,国务院收到中国提出的10名专家名单,经济作战部即被告知其内容。国务院高层官员征求了经济作战部的意见,授权文化关系部执行这个计划。随后,经济作战部进口办公室的工程部主任陶柏(Alex Taub)指派3名官员,对国务院文化关系项目到中国服务的候选人进行面试,其远东部主任雷纳(Charles Rayner)则随时报告面试的进展。

(二)与租借物资管理局(Lend-Lease Administration)的关系

租借物资管理局的权限是只能派遣与军事有关的专家到中国,因此它也与文化关系项目派的人员不同。在实践中,租借物资管理局支付了17名在美国专家的费用,其中16人在运输军事物资的滇缅公路执行抗疟疾使命,另一位是军队兽医,负责医治从俄国运输军事物资的驮畜。

不过,在涉及美国专家的问题上,租借物资管理局和文化关系官员保持了密切合作。在文化关系项目建立前,国务院就向负责中国租借援助的总统行政助理居里(Lauchlin Currie)征询过意见,所有与重庆之间有关这个项目的重要电报也给他看过。反之,任何时候华盛顿的中国官员询问有关美国专家的事,租借物资管理局中国部联络员斯卡伯格(Benjamin Schaberg)都会通知文化关系官员。

(三)与战争情报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的关系

国务院和战争情报办公室都送给中国缩微胶卷、电影、广播节目和杂志,但内容完全不同,在大

^① Memorandum by Mr. Willlys R. Peck of the Division of Cultural Relations, June 14, 1943, FRUS, 1943, China, p. 741.

多数情况下,两个项目在中国达到的经济和社会效果也不同。

战争情报办公室发送战争信息和有宣传价值的最新观点,国务院则发送有教育和科技价值的数据库给中国的大学,以及那些指导中国抗战的知识分子领导者。具体不同之处如下:

1. 缩微胶卷。战争情报办公室只选择刊登最新新闻与观点的期刊拍成胶卷,文化关系项目则缩微拍摄与科技及学术有关的、中国大学感兴趣的杂志和资料。

战争情报办公室的缩微拍摄工作由纽约公共图书馆和瑞柯达克(Recordak)公司完成,文化关系部的则由国会图书馆和农业部完成。

另一个不同是,战争情报办公室缩微胶卷运送到中国,被翻译成中文,印成报纸、杂志,因此只需要一个缩微胶卷阅读器。而文化关系缩微卷被广泛地分配到中国各大学,所以文化关系项目在预算中,要为100个阅读器提供资金。

2. 杂志。除缩影胶片外,战争情报办公室没有运送任何杂志到中国,而国务院为中国大学的阅览室提供了一些有教育价值的纸质杂志。

3. 电影。战争情报办公室送给中国一些新闻片和战争宣传片,文化关系项目则只限于教育影片,如健康、农业、科技以及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等。战争情报办公室影片都是与军事有关的,但文化关系项目选择的是适合中国长久教育的影片,尽管挑选时也考虑到影片在中国抗战中的科学和教育价值。

4. 广播节目。战争情报办公室只向中国传送新闻广播,通过短波从旧金山传递到重庆,再通过中波转播。文化关系项目提出,广播节目要以科学和教育为主题,要写出剧本,要比得上同类电影片。此类节目的录音或广播稿要送达重庆,经过翻译后在那里广播。如果驻重庆大使认为录音是可行的话,内政部负责提供录音。^①

四 结论

1942—1945年美国国务院的中美文化关系项目,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中国提供了技术帮助,促进了中美之间更广泛的文化合作。文化关系项目的进行,使得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机关工作的美国公民,比其他任何国家人员都多。这奠定了美国官方和私人机构与中国政府机关,在知识、学术、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继续合作的基础,也加强了美国对中国的影响。

二战时期,美国国务院的中美文化关系项目,是当时美国开展的对外文化关系项目之一,是由政府支持进行文化交流,由国务院拿出一笔预算来用于文化交流,它表明美国已开始注意把对外文化交流与政治目的有机结合起来。由于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共同对抗德、意、日法西斯的需要,与非战争年代的文化交流相比,美国更加强调文化输出和文化交流的政治含意。这些实践,可以说是美国“文化外交”的开端,后来逐渐形成对外文化战略,主张通过文化的吸引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感召力来配合美国的整体战略和对外战略;通过各种文化交流,在其他国家塑造有利的“美国形象”,输入“美国理念”,以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方。后一点,在抗战时期美国实施对华文化关系项目时,一直想按照美国的民主理念改造中国方面,已经有所体现。

抗战时期,以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项目为主而在中美政府之间开展的文化交流,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① Memorandum by Mr. Haldore Hanson of the Division of Cultural Relations, July 15, 1942, FRUS, 1942, China, pp. 717—721.

首先,文化交流的走向以美国为主。美国方面开展了多项活动,或是在中国传播美国生活方式及文化,或是资助中国人到美国去学习,美国是主动的一方,施加影响的一方。中国是受影响的一方,主要是被动地接受,以及到美国学习技术,政府有意识地传播中国文化的项目较少。

当然,大量中国学生和技术人员到美国去,这本身也是中美文化交流的一个部分。中国人在美国,不仅直接接触并了解美国社会和文化,同时也因为和美国各界的接触,让美国人得以通过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中国、中国人及中国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体现了一种双向交流。但除此以外,中国文化流向美国的走向,就表现得不太明显。

自1943年以后,中国开始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例如:将国立编译馆所编《中国哲学史》等8种有关中国文化的书籍,译成英文向外介绍;又聘请中央大学范存忠教授主编英文《中国文化丛刊》,对外介绍中国文化^①;并由中国驻美大使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密歇根大学提供每校5个奖学金名额,让美国学生学习中国文化以及相关专业的。^②但是,由于战争阻隔和财政经济困难等原因,中国政府在对美国传播中华文化等领域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太少。中国对美文化出口,远远小于来自美国的文化进口,中国对美文化交流存在着“巨额逆差”。这种“文化交流逆差”,造成美国公众对中国及中国文化不了解,认识相当肤浅,甚至是偏见、误解丛生;也使得在文化影响力方面,中美两国处于不对等的地位。

其次,文化交流仍然停留在技术层面上,并未广泛深入到社会科学、思想和文化等领域。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国民政府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二是因为中国信奉教育为技术服务、技术为国家服务的信条,三是因为抗战军事、经济以及战后重建的实际需要,国民政府更强调派遣“军工理医各科有关国防需要者”。此外,美国在自然科学上的国际先进地位以及在人文科学上的相对落后,也是导致中国学生选择理工科的原因。中美文化关系项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美国技术专家来华,以及中国派遣学生到美国学习技术,涉及两国相互了解和交流思想、艺术、文学及社会科学的内容较少,文化交流的方式显得不太平衡。

对此,中美两国都有人意识到这一问题。1944年8月29日《正义报》发表的一篇评论即指出,中国政府只在农业、矿业和工程等方面派出学生赴美培训,但是却缺少对作家和杰出学者的关心。美国驻昆明总领事兰顿(Langdon)赞同这一说法,他也指出,国民党愿意花费中国的外汇储备培训技术人员,却有意不派中国学生到国外学习社会科学。这一政策体现在教育部的项目上,就是强调自然科学,而拒绝西方自由主义的社会和政治观念。教育部于1944年初公布的规则中,明显排斥大学社会科学教授到国外学习或研究。兰顿认为,这一切归因于国民党反对诸如西南联合大学那样的自由主义大本营,那里60%的教师在美或英受过教育,他们抵抗教育部最强烈,怀疑中国的自由,大多数持左翼观点,一直批评国民党。^③

第三,在此时的文化外交中,美国试图向中国传播美国的自由主义和民主思想,甚至想影响国民党,但是,这种努力的效果不大。

曾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工作的クロス(Dean Harold L. Cross)相信,他和其他三位美国教授的工作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让学生了解到美国和英国的新闻自由是中国所没有的。但是,以他的观点来看,这种工作如果是在其他不同的学校里进行,会比在国民党的党校里更有用。^④

① 行政院编:《国民政府年鉴》教育卷,1944年版,第4页。

②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Sept. 15, 1944, *FRUS*, 1944, China, pp. 1151-1152.

③ *The Consul General at Kunming (Langd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 5, 1944, *FRUS*, 1944, China, pp. 1149-1150.

④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ly 14, 1944, *FRUS*, 1944, China, pp. 1146-1147.

美国国务卿的考虑有所不同,恰恰因为中央政治学院不是政府学校而是党校,美国更有兴趣想要了解,利用在这样一所党校里服务的机会是否更有优势。由于很少有外国人被允许加入国民党,并且国民党机关通常不对外国人开放,在国民党机构中任职,就提供了一些特殊机会,可以影响那些外国人平常接触不到的中国人。国务院希望在与国民党的工作中,美国的民主思想可以对国民党产生影响,从而在根源上修改中国的政策。^①

但最后,大使馆终于意识到,通过几个像罗斯这样短期来华的美国人,美国的民主对国民党本身的影响不会很有效,尽管他们对某些中国人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大使馆只有寄希望于更多的美国人做有用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使国民党在某些方面变得更加民主。^②

第四,在这一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除了双方的合作以外,还可以看到中美之间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体现出两国在一些思想和理念上的不同,反映出两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这方面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双方对赴美学生“思想控制”的理解,以及对批评他国事务的态度等问题上。

美国人对官方控制思想和言论是极为敏感的,因而极力反对中国政府在外国控制中国学生。然而在中国看来,对学生出国留学制定规则,设立机构和人员管理和监督学生,都是应该的,不是企图在美国控制学生的思想。美国人习惯批评,认为批评是件好事,任何人和任何国家都有批评的自由;而中国人对此不以为然,特别是不容易接受外国对中国的批评。中美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争执,涉及到思想观念、价值判断、行为准则等差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国文化的某些冲突,表明两国要想密切合作、互相理解,还必须加强文化交流,努力沟通,才能消除成见,并求同存异。

应当承认,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因为地理、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一直都有相当的距离。差异和隔膜,主要是文化之间的对立所致,而文化交流可以缩短中美认知的距离。用文化的魅力和力量,消弭横亘在中美之间的差异和隔膜,拉近彼此的距离,是中美两国都应重视并付诸于实践的。从抗日战争时期中美文化交流的这段史事当中可以看出,进行国家间、文化间的长期互动,增强对彼此文化、历史和现状的了解,是增进感情和友谊的基础。此外,把文化作为一张王牌打出去,也是服从于整体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步骤。对外文化交流,不仅仅是为交流而交流、为文化而文化,可以把这种交流与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对外文化战略。在这方面,60年前的美国对华文化外交,也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作者杨雨青,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高莹莹)

①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Mar. 14, 1944, *FRUS*, 1944, China, pp. 1125.

②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Gaus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ly 14, 1944, *FRUS*, 1944, China, pp. 1146-1147.